

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 ——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 為中心

閻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1662 年，鄭成功（1624-1662）驅逐荷蘭人後，大量漢人移民進入臺灣，歷經 22 年鄭氏三代的統治，康熙 22 年（1683）7 月，施琅（1621-1696）於澎湖大敗劉國軒（1629-1693）所領導的鄭軍，「一戰而澎湖克復」，臺灣新附版圖。

康熙 23 年（1684），福建臺灣僧道換給新度牒，此一目的是在汰換明鄭時期所頒發的度牒，方便重新認定僧人身分。雖然鄭氏三代治臺僅 22 年，但在度僧發送度牒，每年至少有 8 位，但因臺灣未設戒場，兩岸無法交流情況下，可能都是沙彌身分。

1684 年，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由福建清縣移諸羅縣，麒光因感於「臺灣草昧初并，無文獻之徵，郡守暨陽蔣君經始其事，鳳山楊令芳聲、諸羅季令麒光廣為搜討。」1685 年，《臺灣府志》未成，季麒光以丁憂去職。季麒光所著的《臺灣郡志稿》六卷、《山川考略》一卷、《海外集》

一卷、《蓉洲文稿》一卷均已佚失。2006 年，上海圖書館康熙三十三年藏本《蓉洲文稿》（附《東寧政事集》）的發現並重新點校出版，為清代治臺初期佛教提供信史資料。

在時間上，本文以蔣毓英（生卒年不詳）編修《臺灣府志》（1685）為始，下至《諸羅縣志》脫稿止（1717），地理空間上則以清治臺行政區域的一府三縣（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為範圍，探討清代治臺初期（1685-1717）三十餘年間的佛教人物及情況。

關鍵詞： 季麒光、諸羅縣、沈光文、度牒



Buddhism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Qing : in Light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Dongning zhengshi ji*

KAN, Cheng-ts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Zheng Chenggong 鄭成功 defeated the Dutch in 1662, large numbers of Han Chinese began migrating to Taiwan. In July 1683, the Qing general Shi Lang 施琅 vanquished Zheng's army in Penghu. Thus was Taiwan newly and form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Qing dynasty's territory.

In 1684, the Fujian governor began issuing new ordination certificates for Buddhist monks and Taoist priests,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certificates issued under Zheng's rule and re-authorize their identity.

In 1684, the first governor of Zhuluo District was Ji Qiguang 季麒光, who had just moved to Taiwan from Qi County in Fujian. He wrote, "Taiwan's culture is rudimentary and lacks credible historical literature. Jiang, the county guard, started the work of compilation. Then both Yang Fangsheng

Yang Fangsheng 楊芳聲, the governor of Fengshan County, and Ji Qiguang, the governor of Zhuluo County collected historical data widely." In 1685, Ji resigned and left the historical compilation of the *Taiwan fuzhi*

臺灣府志 unfinished. All of his works including *Taiwan junzhi gao* 台灣郡志稿, *Shanchuan kaolue* 山川考略, *Haiwai ji* 海外集, and *Rongzhou wengao* 蓉洲文稿 have been lost. In 2006, the *Rongzhou wengao* with a supplemental section entitled “Dongning zhengshi ji” 東寧政事集 was discovered at the Shanghai Library. It now provides us with credi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 the early Qing’s activities relating to Buddhism in Taiwan.

The historical scope of this article begins in 1685, when Jiang Yuying 蔣毓英 began compiling the *Taiwan fuzhi* 台灣府志, and ends in 1717, when the *Zhuluo xianzhi* 諸羅縣志 was published. The geographical scope is limited to the Qing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aiwan: Taiwan Prefecture 臺灣府, Taiwan District 臺灣縣, Fengshan District 鳳山縣, and Zhuluo District 諸羅縣. The main themes deal with Buddhist figures and their activities during these thirty years.

Keywords: Ji Qiguang, Zhuluo District, Shen Guangwen, ordination certificates

一、前言

臺灣佛教之傳，始於漢人移民。《臺灣風土志》載：「佛教之由大陸傳入臺灣，遠在荷蘭人侵據以前。」¹1662年，鄭成功（1624-1662）驅逐荷蘭人後，大量漢人移民進入臺灣，歷經22年鄭氏三代的統治，康熙22年（1683）7月，施琅（1621-1696）於澎湖大敗劉國軒（1629-1693）所領導的鄭軍，「一戰而澎湖克復」，²臺灣新附版圖。

明鄭、清代臺灣佛教研究文獻，光復後雖有《臺灣文獻叢刊》的陸續編成，但幾乎是以一般寺宮廟宇歷史介紹為主，僧人資料少之又少，因此，明清兩代臺灣佛教的研究困難重重。³

先期研究以鳥瞰式居多，李添春的〈臺灣佛教史要〉上從荷西下至日本殖民時期，作為臺灣佛教研究者的先行者及權威學者，點出了「福建之黃檗山與臺灣有密切之關係」，並指出明鄭時期所建的寺院彌陀寺、興隆寺、龍湖巖等；⁴另一篇〈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主要回顧荷蘭人據臺時期天主教的傳入，以及隱元禪師與鄭成功交往的軼事，其中僧侶部分頗見鄉野傳奇；⁵梁湘潤、黃宏介合編的《臺灣佛教史初編》，從明末佛教的特色，一直論述至戰後臺灣，雖非學術性與條理性的論

※ 收稿日期 2018.7.25，通過審稿日期 2018.8.28。

¹ 何聯奎、衛惠林，《臺灣風土志》，臺北：中華書局，1989年，頁123。

²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年，頁3。

³ 《臺灣文獻叢刊》的編印，始於1946年冬，臺灣銀行創立經濟研究室。1957年8月至1972年12月陸續出版一叢刊309種、595冊，以下不另註明。

⁴ 李添春，〈臺灣佛教史要〉，《中國佛教史論集》冊3，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頁915-948。

⁵ 李添春，〈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中國佛教史論集》冊8，臺北：大乘文化，1979年，頁57-73。

述，但許多觀點值得重視；⁶江燦騰的《臺灣佛教史》，明清臺灣佛教方面著重介紹觀念性問題，如出家佛教源流、文化傳播趨勢與特色、宗教營生、僧侶墮落、香花僧等問題；⁷楊惠南〈明鄭時期臺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明清時期臺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指出明、清兩朝的臺灣佛教，有兩個重大現象是：一是「名士佛教」，二是神佛不分；⁸匡宇的〈臺灣佛教史〉，概略式地介紹了明鄭、清代，以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及左營興隆寺碑概括明鄭時期的佛教，並討論「逃禪」的明末遺臣；清代僧人形象則取自王必昌纂輯的《重修臺灣縣志》；⁹臺灣有關黃檗山派的研究，僅見野川博之之考論，因為史料的問題，突破性不大，不過初步解答了黃檗寺在臺南的興衰。¹⁰

明末清初臺灣佛教因史料的欠缺，研究成果難以突破，若不輔以田野調查，更難釐清當時的佛教傳播樣貌，例如 2012 年，雲林北港朝天宮相關人士，在福建仙遊找到當年帶著媽祖來臺的開山住持樹璧和尚（1664-1723）的墳位，俗名嚴瑞義的樹璧，原出家仙遊龍紀寺，30 歲（1694）抵笨港創建北港朝天宮，46 歲回到故里。¹¹由於樹璧和尚墓的發現，證實北港朝天宮之創建歷史，同時也釐清他當時活動的軌跡。

⁶ 梁湘潤、黃宏介合編，《臺灣佛教史初編》，臺北：行卯出版社，1993 年。

⁷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9 年。

⁸ 原載《臺灣文獻》53:3，2002 年，收在《當代臺灣佛教文獻》，<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md.html#03>，2018/04/26。

⁹ 匡宇，〈臺灣佛教史〉，《中國佛教史論集》冊 8，臺北：大乘文化，1979 年，頁 11-18。

¹⁰ 野川博之，〈台南黃檗寺考——古黃檗末寺の盛衰〉，《黃檗文華》122，2003 年，頁 53-75。

¹¹ 蔡維斌，〈北港朝天宮傳說迎媽祖來台的和尚找到了〉，《聯合報》，2013 年 11 月 22 日，A26。

本文除回溯明鄭三代的佛教外，清初佛教之時間界定，以蔣毓英（生卒年不詳）編修《臺灣府志》（1685）為始，下至《諸羅縣志》脫稿止（1717），地理空間上則以清治臺行政區域的一府三縣（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為範圍，在史料上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為中心，探討清代治臺初期（1685-1717）三十餘年間的佛教人物及情況。

二、季麒光及《蓉洲詩文稿》

（一）季麒光治績與交友

季麒光，字聖昭，生卒年不詳；康熙 15 年（1676）進士。¹²據《福建通志臺灣府》載：

季麒光，榜姓趙，江南無錫人，康熙丙辰進士，二十三年，由閩清縣移任。縣初設，無城郭，無街市都聚之會，一望蓁茅，民裸而貧，地□而曠。所隸土番，皆文項雕題，重譯始通一語，驟設官吏，束以法律，則日夕驚怖若驚獸入檻，觸藩躑躅，不有其生。麒光推心循拊，巽其辭命，使之自化。初定制丁田賦役，如理亂絲，為之條分縷析，寧簡無苛。方謀經始，而遭外難，大吏以巖疆難其人，檄令節哀視事候代。乃定賦額丁數，課士招商，綏番墾荒，拔儒童才質之佳者接禮之。於是此中人始知有禮教之樂，文物之美比於內縣。爰輯有臺灣府志，綜其山川、風物、戶口、土田、扼塞以佐治理，未成而代者至。三十五年，副使高拱乾踵成之。臺灣有志，自麒光始也。¹³

季麒光治諸羅功績，史多稱讚，尤其是《臺灣府志》（蔣志）的纂修，「自

¹² 清·李桓撰，《清耆獻類徵選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頁 604。

¹³ 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頁 494。

麒光始也」。這段過程，在《臺灣府志》附錄（一）引《蓉洲詩稿》中季麒光所撰的〈臺灣志書前序——代周又文憲副〉曰：「臺灣草昧初并，無文獻之徵，郡守暨陽蔣君經始其事，鳳山楊令芳聲，諸羅季令麒光廣為搜討，閱三月而蔣君董其成。」¹⁴

文中的「蔣君」即是指康熙 23 年（1684）出任首任臺灣之府的蔣毓英（生卒年不詳），季麒光與他同年到任諸羅，隨即由季麒光等「廣為搜討」，《臺灣府志》不過三個月即成，惟直至康熙 27 年（1688）才刊刻，時季麒光已不在縣令任上。

除了諸羅治績外，季麒光與流寓臺灣三十餘年的沈光文（1612-1688）等組「東吟社」，據《臺陽見聞錄》載：

康熙二十四年，鄭縣沈斯庵光文流寓臺灣，招無錫季蓉洲、華蒼崖、宛陵韓震西、會稽陳易佩等，聯為詩社，取謝太傅「山以東重」之意，名曰東吟社。蓋臺灣之山，在東極高峻，不特人跡罕到，且從古至今絕少有題詠之者。今與諸社翁共創始之，分題拈韻，擇勝尋幽，可與王右軍之茂林修竹、石季倫之流水長堤，並垂不朽。¹⁵

將東吟社之組成比喻為東晉書法名家王羲之（303-361）南渡後的悠遊山水與好友組文人社團，以及西晉文學家「金谷二十四友」領袖石崇（249-300）政治文學團體。

就季麒光所留下來的唱和詩文集來看，確實保留了諸多臺灣當時的歷史景物。而季麒光與沈光文的交往尤值得重視，「逃禪」的沈光文現僧相，反映臺灣「名士佛教」的部分樣貌（詳後）。

¹⁴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34。

¹⁵ 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09 種，頁 126。

（二）《蓉洲文稿》及《東寧政事集》

《蓉洲詩文稿選輯》及《東寧政事集》皆為清復臺後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所著，《蓉洲詩文稿》大部分是其來臺後與時人相唱和之作，全稿分《蓉洲詩稿選輯》七卷與《蓉洲文稿選輯》全卷；《東寧政事集》則為季氏在諸羅縣令任上往來各種文書檔案，全一冊。其中《蓉洲文稿》在乾隆 17 年（1752）王必昌編修《重修臺灣縣誌》時，檢視與臺灣有關的各家著作，羅列「臺灣雜記（一卷）、蓉洲文稿（一卷）、山川考略（一卷）、海外集（一卷），俱諸羅縣知縣無錫季麒光蓉洲著……右自『東番記』以下，作者二十一家、為書三十八種，邑無藏版，亦少懸籤；年代未遙，散軼過半……。」¹⁶時人吳幅員在編輯《臺灣輿地彙鈔·弁言》說「除撰著『臺灣雜記』外，並有『臺灣郡志稿』六卷、『山川考略』一卷、『海外集一卷』、『蓉洲文稿』一卷，惜均已佚。」¹⁷

2003 年，大陸學者李祖基特訪上海圖書，於該館古籍部看到康熙 33 年（1694）、塵封三百餘年與清初臺灣歷史密切相關的《蓉洲詩文稿》刻本，經校注，於 2006 年與《東寧政事集》合併在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¹⁸

失佚三百餘年的《蓉洲詩文稿》，與臺灣歷史文化有關者頗多，尤其是延續明鄭以來的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樣貌，當可獲得部分的輪廓。

¹⁶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誌》，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頁 16。

¹⁷ 收在清·吳振臣，《臺灣輿地彙鈔·弁言》，臺灣文獻叢刊第 230 種，頁 1。

¹⁸ 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出版說明》，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4-5。

三、明鄭時期佛教與僧人（1661-1683）

（一）徵收度牒銀

鄭氏三代統治臺灣凡 22 年，永曆 15 年（1661）5 月，鄭成功攻佔赤崁城，改赤崁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設一府二縣。永曆 18 年（1664）3 月，鄭經廢東都改稱東寧。¹⁹《小琉球漫誌》載：「辛丑（1661）歲，偽鄭成功敗自長江歸，土人勾之往，由鹿耳門入，潮水忽添數尺，紅毛戰敗逃歸。成功因名臺灣為偽東都，設一府二縣。府曰承天，縣曰天興、曰萬年。」²⁰

明鄭時期來臺僧人有記錄者甚少，但每年都會徵收度牒銀若干，根據《東寧政事集》記載：「僧道：偽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二百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²¹略加計算，可以得知，一年僧人 8 人，道士 37 人，實徵 201 兩。²²如果鄭氏三代每年都徵二百兩度牒銀，以二十年計，當時僧侶人數恐超過百人，當然，道士人數更多。

康熙 22 年（1683），臺灣入清版圖，越年，奉部文內開：「應將臺灣僧道牒文換給，免其每年徵餉。」²³可見清初治理臺灣是承認鄭氏三代所發之度牒，並給予免徵度牒銀的換證。

（二）左營興隆寺開山碑

明鄭統治下的 1665 年 3 月之後，東寧一時來了四位僧人，這已佔

¹⁹ 陳正茂、林寶琮、林世宗，《新編臺灣史》，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2008 年，頁 95。

²⁰ 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海東紀勝》卷 2，臺灣文獻叢刊第 3 種，頁 16。

²¹ 清·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64。

²² 計算公式為 $x = \text{僧}$ ， $y = \text{道}$ ， $x + y = 45$ ， $2x + 5y = 200$ 。

²³ 清·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64。

徵度牒銀全體人數之半，根據今現存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新下街興隆寺內的〈開山碑記〉記載：

大清康熙乙巳年，臨濟宗支僧勝芝、茂義、伽、普□，分濟於東寧，見龜山之秀麗、形景而有奇；就處搭蓋草亭，登山伐木，烹茗濟渴行人。嗣募建寺宮，崇祀佛神，護官庇民，安行海舟。自勞苦勤耕，築田、蓋店，以資香燈。後蒙縣主李、參府陳公批，捨北門菜園一處、店地一所，垂寺宮永奠，宗支接祀。又蒙董、胡二公添捨香燈業課。²⁴

文中「分濟於東寧」，即是鄭經於 1664 年 3 月改名後之稱。從上文也可知僧人勝芝一行，最早即是在康熙 4 年（乙巳，永曆 19，1665）來臺，為臨濟宗支派。此碑無落款，但從碑文之「康熙乙巳年」看，時臺灣仍在鄭氏統治之下，敢稱「大清」者，碑刻必然是在康熙 22 年（1683）施琅入臺後所立。

康熙 23 年置鳳山縣，而就清代康熙鳳山知縣姓李者僅康熙 56 年（1717）由南平知縣調任的李丕煜（任期 1717-1722），²⁵據《鳳山縣采訪冊》載：「在舊城內龜山麓（興隆），縣西十五里，屋九間（額「興隆寺」），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李丕煜建。」²⁶故可知此碑必然立在康熙 56 年之後，當時正式的名稱是「興隆寺」。

這「臨濟宗支僧」師徒四人因見龜山秀麗，藉由「搭蓋草亭，登山伐木，烹茗濟渴行人」而募款建寺，他們自食其力，「勞苦勤耕，築田、蓋店」作為香燈資，這表現出禪宗的農禪精神，但因缺乏信徒的布施，

²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頁 20。

²⁵ 清·倪贊元，《鳳山縣采訪冊·官職·知縣·戊部》，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頁 191-192。

²⁶ 清·倪贊元，《鳳山縣采訪冊·規制·祠廟·丁部》，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頁 170。

而必須築田、蓋店以自給自食或出租，這不僅是明鄭時期，乃至清初臺灣佛教僧侶的共同現象，興隆寺僧到了清代，在官府的支持下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三）寧靖王捨宅為寺後之住僧

今臺南市大天后宮原為寧靖王邸，施琅定臺後改建天妃宮，蔣毓英的《臺灣府志》說：「天妃宮二所：一在府治鎮北坊赤崁城南。康熙二十三年，臺灣底定，將軍侯施同諸鎮以神有效順功，各捐俸鼎建，廟址即寧靖王故宅也。」²⁷這座寧靖王邸，根據康熙年間的《閩遊偶記》載：「媽祖廟（即天妃宮）在南寧坊，有住持僧聖知者，廣東人；自幼居臺，頗好文墨。嘗與寧靖王交最厚，王殉難時，許以所居改廟，即此也。」²⁸

施琅攻臺、寧靖王自縊前一年（1682），寧靖王「素不喜佛事，是年忽持齋誦準提金剛經咒，蓋其性地光明，故能了然皈正。」²⁹寧靖王開始對佛教發生興趣，與越年鄭氏政權潰敗前的政治氣氛不無關係。

康熙 22 年（1683），馮錫圭等降表出鹿耳門，朱術桂「冠服乘輿出，與鄭克塽、國軒、錫范、繩武、洪磊等諸當事言別，又與左右鄰老辭。遂大開門戶，命僧人守候，遂望北叩首二祖、列宗。」³⁰自殺前夕「命僧人守候」，此僧或許即是聖知。

從上文得知明鄭滅亡前有聖知和尚在臺南地區活動，季麒光稱「其遺宅為天妃神祠，住僧于後楹大士傍奉王為捨宅主」，³¹比對今大天后宮

²⁷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歲時·廟宇》卷 6，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頁 70。

²⁸ 清·吳振臣，《臺灣輿地彙鈔·閩遊偶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頁 19。

²⁹ 清·沈光文，《荅洲文稿選輯·寧靖王傳》，頁 121。

³⁰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頁 433。

³¹ 清·沈光文，《荅洲文稿選輯·寧靖王傳》，頁 122。

仍有奉祀朱術桂的牌位一座，上書「本庵捨宅檀越明寧靖王全節貞忠朱諱術桂神位，住持僧宗福耆士楊陞莊咨等全全」。³²住僧奉寧靖王為捨宅主，或許就是「住持僧宗福」。

（四）黃檗山僧繼成與良準標和尚

1. 僧繼成

鄭成功派船護送隱元禪師（1592-1673）赴日引為一段佳話，隱元在順治 11 年（永曆 8，1654）5 月 10 日離開主持十七年的福清黃檗山萬福寺後，5 月 20 日至泉州，6 月 3 日至中左（廈門），「寓仙岩，藩主送齋金為供」，3 月 21 日「藩主備舟護送」，於同年 7 月 5 日抵長崎。³³

鄭成功與黃檗山僧（臨濟宗）關係匪淺，明鄭時期的東寧境內即有黃檗庵的建立，正如連雅堂謂：「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蘗（檗）之徒，實授衣鉢……。」³⁴這說明有清一代黃檗山僧具有一定影響力，黃檗山僧的來臺史有記載。

李添春在〈臺灣佛教史要〉說：「隱元禪師之弟子日僧仲祺和尚，曾住福清黃檗（檗）山時，有見住臺灣之法弟繼成，登山請設齋上堂。又紫松禪師偕臺灣之比丘尼實法，信女如淑、如珍等登山，設齋請上堂。」³⁵如此看來，明鄭時期曾有黃檗山寺僧繼成在臺，直到清代仍見其活動。

繼成和尚曾募緣重建清領後府城的黃檗庵，據《臺灣府志》載：「黃檗庵在海會寺南數里。壬申年，災於火；歲癸酉，僧繼成募緣重

³² 臺南大天后宮管委會，《明朝寧靖王府邸祀典臺南大天后宮》，臺南：臺南大天后宮管委會，2005 年，頁 2。

³³ 性派，《黃檗開山普照國師年譜》卷下，刻版，編撰於 1684 年之後，頁 2。

³⁴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頁 567。

³⁵ 李添春，〈臺灣佛教史要〉，《中國佛教史論集》冊 3，頁 937。

建。」³⁶又《續修臺灣縣志》則指出黃檗庵為康熙 27 年（1688）左營守備孟大志建。³⁷又康熙 34 年（1695）府城海會（開元）寺第二代住持福宗建造之梵鐘銘文上的「諸山鎮釘助緣和尚」共八人，即心常、募雲、本空、日珠、智生、敬本、文遠、繼成，「繼成」名列其中。³⁸如此看來，活躍於清領初期的繼成和尚，極可能是明鄭時期來自黃檗山，且是隱元之弟子。

2. 天后宮的「首任」住持

在今大天后宮聖父母廳所奉之〈奕葉相承〉歷任住持僧牌位書有「第一代泉州開元當山示寂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主席黃檗四堂誌戴良準紫雲弘開戒法標大和尚蓮座」，清楚顯示第一代住持是來自泉州開元寺，並主持過黃檗山寺，大天后宮以「戒法標」相稱，這恐有問題。此牌位所透露的歷史訊息是，「良準」為剃（外）號，「紫雲弘開戒法」有其歷史意義，「紫雲」二字為泉州開元寺的別稱，根據道光《晉江縣誌・寺觀志・城中寺觀・開元寺》載：「開元寺，一名紫雲寺，在肅清門外。」³⁹「弘開戒法」是傳戒而言，「標」則是譜名（內號），根據中國佛教傳統，省略法派演字，故可知天后宮首任住持應為「良準□標」，因其「主席」黃檗，而黃檗山第 14 代住持為良準明標（1652-1734），與大天后宮〈奕葉相承〉所載為同一人。根據《黃檗山寺志》記載，良準明標為黃檗山第 14 代住持，其生平如下：

第十四代明標良準禪師，派行宗標，觀幻道人其別號也。泉州銀同人。父乾用林公，母黃氏。九月十九日誕，年十七，開元紫雲

³⁶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70。頁 220。

³⁷ 清・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 5，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頁 342。

³⁸ 王進瑞，〈開元寺緣起に就て〉，《臺灣佛教》21:4，1943 年，頁 33。

³⁹ 〈南陳宗親網・泉州開元寺〉，<http://www.nanchens.com/xqxx/xqxx27/xqxx27012.htm>，2017/4/5。

寺淡源耆德為之難染。越年，稟承天寺時現和尚戒。甲寅（康熙 13，1674 年）春，檨山謁本師廣超老和尚……乙卯（康熙 14，1675 年）春解制，蒙囑累歸，挂錫清源。戊午（康熙 17，1678 年），奔本師喪時，住紫雲清居。辛酉（康熙 20，1681 年）造本師塋……康熙四十七戊子（1708）年，主席黃檗，立兩序。……康熙六十（1721）年，開元準提閣，諷華嚴祝聖，四方雲集，求戒亦方便，勉應。雍正二（1724）年甲辰，福清邑侯張廷琰、總戎蔡晏復敦請再住黃檗。九月十一日進院結制，開爐上堂……。丙午（雍正）四（1726）年退席……。辛亥（雍正 9，1731 年）八月，復就開元宏戒。甲寅（雍正 12，1734 年）十月十二日，自撰塔銘示寂，坐七十二夏，壽八十三，塔全身于黃檗桑池園三塔右側，語錄八卷隨大藏經流通。⁴⁰

良準明標的生平非常清楚，從上述可得知，其生年是順治 5 年（1652），卒年為雍正 12 年（1734）。良準明標禪師 17 歲（1666）出家，康熙 13 年（1674）到黃檗山參學廣超老和尚，康熙 14 年（1674）累歸「挂錫清源」，這裡的「清源」是指泉州清源山承天禪寺。康熙 47 年（1708）正式主持黃檗山，康熙 60 年（1721）在開元寺傳戒，這時良準明標已 72 高齡，並從黃檗山退位，否則不會到了雍正 2 年（1724）「復敦請再住黃檗」。雍正 4 年正式從黃檗山退位，此時良準明標更是高齡 77 歲。雍正 9 年（1731），於泉州開元寺再度傳戒，雍正 12 年（1734）圓寂。

康熙 13 年，良準明標到黃檗山拜謁，禮廣超超宣（1599-1678）為師，「明標」二字應是從這裡所得的譜名，根據《黃檗山志》載〈明第一代黃檗開法圓悟密雲祖師源流法派〉為：「祖道戒定宗 方廣正圓通行超明實際 了達悟真空」，師徒二人分別是「超」與「明」字輩。⁴¹

⁴⁰ 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黃檗山寺志》卷 4，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192-194。

⁴¹ 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黃檗山寺志》卷 4，頁 26。

康熙 14 年良準明標離開黃檗山，直到其師廣超圓寂時才又回到黃檗山，之後又住回泉州開元寺。康熙 20 年時良準明標為其師造塔，但是，在康熙 47 年被迎請回黃檗山住持之前，總共約有 27 年的時間動向不明。《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說：「施琅從泉州聘請大開元寺『第一代泉州開元當山示寂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主席黃檗四堂誌戴良準紫雲弘開戒法標大和尚』住錫大天后宮，主持大天后宮廟事。」⁴²如果施琅聘請良準明標任大天后宮住持，必然在康熙 22 年或 23 年，但當時的住僧為寄漚（詳後）。

良準明標任大天后宮住持的時間為何？若從其牌位「第一代泉州開元當山」所示，應指良準明標卓錫於泉州開元寺，其在泉州開元寺有兩個時間點，即康熙 60 年（1721）與雍正 9 年（1731）。如果在康熙 60 年之後良準明標被聘為住持，距施琅卒於康熙 35 年（1696）已過二十餘年，受聘為天后宮住持當另有其人。

綜合上述，臺南大天后宮是一座與福建黃檗寺法脈關係密切的道場。從寄漚（1683 年）到泉州開元寺當山良準明標（1708 年主席黃檗）任天后宮住持中間的 25 年間，雖未見有相關住僧的記載，但亦不能排除 1708 年良準明標住持福清黃檗寺後亦兼任臺南大天后宮住持。但良準明標是否曾親自來臺任天后宮住持，頗有疑問。

從上述來看，隱元禪師東渡日本後，開創黃檗宗，從 17 世紀晚期至 18 世紀早期快速發展；⁴³黃檗宗對日本佛教產生重大影響之際，在臺灣也產生歷史影響。

⁴²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1 年，頁 67-68。

⁴³ 吳疆，〈黃檗僧東渡斷絕考：十八世紀江戶幕府的唐僧招請〉，《漢語佛學評論》5，2017 年，頁 196。

（五）龍湖巖參徹和尚

昔臺南縣六甲鄉赤山龍湖巖首位住僧參轍（?-1790），相傳於明鄭時期來臺，該巖亦為鄭氏參軍陳永華（1634-1680）所建。

清代方志或野史，皆指向龍湖巖為陳永華所建，一說是陳永華「師次」赤山堡，一說是「退休不豫事」。所謂「師次」，即帶兵前來，這和鄭氏治臺「寓兵於農」的政策有關。而闢建龍湖巖作為退休終老之地，乃是陳永華被當權派馮錫範、劉國軒所排擠之故。

據今龍湖巖前所存乾隆 47 年（1782）〈孫太爺開租碑〉所載：「偽鄭之時，以天興、萬年二州官分兵屯田，自給軍食……。」⁴⁴由於龍湖巖附近為官兵屯田之地，因此，龍湖巖的發展必然受限於此，主要是地方十分窮困。情況是「彼時地廣人稀，崩壓墾換，歉收酌減，故無瘦瘠重賦之虞。今賦有常則，田無墾換，歉收不敢望減，農棋等物皆由己出：偽例所以不可行於今也。」⁴⁵

龍湖岩果是陳永華所建，那就有兩個可能時間，一是「師次」時，一是「退休不豫事」時。首先，康熙 4 年（1665），陳永華師次赤山堡建寺，其情況是：

本廟俗稱岩山廟，是一小寺宇。鄭成功參謀陳永華登赤山，於其坎聽聞和著晨鐘暮鼓的誦經之聲，就而見之，唯有二名僧侶，愛其信仰之深厚，而建廟宇與之。⁴⁶

相傳龍湖巖首位住持僧參徹禪師，《臺灣詩鈔》〈碧雲寺〉條下載：「康

⁴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孫太爺開租碑》，頁 126。

⁴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孫太爺開租碑》，頁 126。

⁴⁶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龍湖巖》，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3 年，頁 100。

熙初，僧參徹東來，住錫龍湖巖」。⁴⁷根據大仙寺所提供參徹從龍湖巖往大仙寺的傳說是，康熙 5 年（1666），陳永華禮請參徹來臺，卓錫龍湖巖，康熙 58 年（1719）轉往大仙寺。⁴⁸後來參徹復又轉往碧雲寺「愛其山林之秀，遂闢茅結廬，奉龍湖巖之佛祀之。參徹沒，眾葬之寺前，為建浮圖；今尚存。」⁴⁹根據大仙寺所存參徹禪師墓碑落款年代，其圓寂於乾隆 55 年（1790），如果他是康熙 5 年來臺，去世時年齡恐超過 140 歲，其可能性太小。參徹來臺或許在康熙末、乾隆初較合理，而當時臺灣早已歸入清代版圖超過 30 年。

四、清初治臺的佛教樣貌

前述「臺灣有志，自麒光始」的臺灣第一部方志《臺灣府志》載：「（風俗）佞佛諂鬼，各尚茹素，或八、九齋、朔望齋，或長齋。無論男女老幼，常相率入禮拜堂誦經聽講，僧俗罔辨，男女混淆，廉恥既喪，倫常漸乖，故異端之教不可不距也。」⁵⁰說明清初臺俗民喜歡茹素、入廟禮拜的傳統，從明鄭時期至清初治臺與佛教有關的寺廟計有：天妃宮（鎮北坊）、慈濟宮（四所）、觀音廟（鎮北坊觀音亭）、觀音廟（諸羅縣目加溜灣社）、龍湖巖。民眾逢年過節喜歡逗留寺廟，其他民間信仰的寺廟在臺灣府縣、諸羅、鳳山至少還有 11 座。⁵¹

開啟臺灣方志編修的季麒光在勸募僧田時以「弟子」自稱，⁵²應為佛教徒，除與「逃禪」僧沈光文交往頗厚外，他扶持佛教亦不遺餘力。

⁴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詩鈔》卷 17，臺灣文獻叢刊第 280 種，頁 335。

⁴⁸ 黃文博、涂順從，《關仔嶺大仙寺》，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頁 10。

⁴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詩鈔》卷 17，頁 335。

⁵⁰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58。

⁵¹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69-71。

⁵² 清·季麒光，《蓉洲文稿選輯·天妃宮僧田小引》，頁 131。

雖「首創『臺灣郡志』，未及終編，以憂去。」⁵³季麒光因丁憂守孝而去官，於諸羅縣令「在任踰年」。⁵⁴他自康熙 23 年末來臺，表示他至少任至康熙 24 年（1685），但他並未馬上離開臺灣，沈光文 76 歲時在〈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末尾提到「今先生行矣，余日益老矣」，落款「康熙丁卯孟夏望日」，「丁卯」即康熙 26 年（1687）。⁵⁵也就是說，季麒光雖在 1685 年卸任，但直到 1687 年 4 月（孟夏）仍在臺，同年「五月望日」季麒光與分巡臺廈道周昌等文武諸君集於北園，「余將行，得其勝」而賦詩誌謝。⁵⁶表示他直到 1687 年 5 月才成行，故他在臺時間約有 4 年左右。

（一）大天后宮的僧人

康熙 22 年（1683）6 月，施琅克澎湖，朱術桂知大勢已去「具冠服拜天地祖宗，與臺人從容別飲，以三印授克塽而自殺，五妾殉焉」；8 月「施琅統舟師至臺灣受降」。⁵⁷前述，寧靖王捨宅為寺的對象為聖知和尚，但翌年施琅囑改建為天后宮時，已不見聖知和尚之名。《臺灣府志》載：「康熙二十三年臺灣底定，神有效靈，靖海將軍侯施琅同諸鎮捐俸鼎建。」⁵⁸但「觀成于吳總戎之鳩工」。⁵⁹吳總戎即是吳英，福建泉州人，原是鄭氏部將，康熙 2 年（1663）降清，攻臺時任副將，施琅班師後暫留吳英鎮守臺灣。⁶⁰

⁵³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頁 51-52。

⁵⁴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頁 180。

⁵⁵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頁 1。

⁵⁶ 清·季麒光，《蓉洲詩稿選輯·五月望日》，頁 62。

⁵⁷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 種，頁 79。

⁵⁸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19。

⁵⁹ 清·季麒光，《蓉洲文稿選輯·募修天妃宮疏》，頁 127。

⁶⁰ 清·李桓，《清耆獻類徵選編·吳英》，頁 566-570。

雖說是「施琅同諸鎮捐俸鼎建」，實是「下至商販估漁，凡往來資息于重洋巨浪之中者，各發歡喜心，共助勝因。」⁶¹改建完成後的天后宮「棟宇尤為壯麗；後有禪室，付住持僧奉祀。」⁶²當時的住持僧為寄漚，季麒光見到的情況是：

天妃一宮，前祀海神聖母，後奉觀音大士，皆以慈航普渡，故爾供養法應平等。住僧寄漚焚修祇侍，晨昏讚頌……。但香積常空，緇衣莫續，則香火誰資？弟子季麒光以招墾荒園二十七甲，永為常住執持之業。……身為窮子，財施法施，一切無有，惟從楮墨，倡導四眾，寄漚勉之！願力既堅，機緣自來，當有智覺善人，乘願護持，為大導師，弘開佛境……。⁶³

寄漚和尚為「臨濟橫支」，授簡於季麒光，望其「申言倡導」募修天后宮，寄漚「發大弘願力，欲就宮傍餘地，作左右廊三間，位置僧寮前，樹山門一層，廓戲樓舊址而大之。庶幾有門有殿，有廊廡，有維摩室，有香積廚。」⁶⁴可見今日大天后宮的規模是在寄漚和尚手中完成的，如果寄漚不是官聘住持，並得官方協助，如何募建天后宮？故知，寧靖王府改建為天后宮前，曾經歷捨宅為寺的階段，時住僧為聖知，而當康熙23年改建時，住僧為寄漚。

因此，入清版圖後所倡修的《臺灣府志》載：「（天后宮）後有禪室，付住持僧奉祀」，此住持僧當指寄漚。而《續修臺灣府志》所載的：「有香燈園二十一甲，在安定里，年得租粟一百二十五石；諸邑令季麒光置，交廟僧掌收」，⁶⁵與上述「弟子季麒光以招墾荒園二十七甲，永為常住執

⁶¹ 清・季麒光，《蓉洲文稿選輯・募修天妃宮疏》，頁127-128。

⁶²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219。

⁶³ 清・季麒光，《蓉洲文稿選輯・天妃宮僧田小引》，頁130-131。

⁶⁴ 清・季麒光，《蓉洲文稿選輯・募修天妃宮疏》，頁128。

⁶⁵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261。

持之業」，田園雖有數甲之差，但都在季麒光任內所設。施琅取臺第二年，即康熙 23 年，康熙帝題准福建轄下的臺灣僧道換給新度牒。⁶⁶這一政令非常重要，表示了鄭氏治臺時期的僧道身份獲得新政權的承認。

（二）逃禪僧沈光文

諸羅縣令季麒光與流寓臺灣的明末文官沈光文（1612-1688）之交膾炙人口，據《臺灣府志》載沈光文生平、來臺過程，與變服逃禪的經過如下：

沈光文，字文開，別號斯菴，浙江鄞縣人，故相文恭公世孫，以副車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之間，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少卿。辛卯年，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壬寅，八閩總制李公諱率泰聞其名，遣員致書幣邀之，期菴不就。七月，挈其眷，買舟欲入泉州，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不能返棹，遂寓居焉。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知經無能為，且以一賦寓譏諷，為忌者所中，幾死于□。乃改服為僧，入山不出，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所著文有《臺灣賦》、《東海賦》、《槎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菓木襍記》。⁶⁷

永曆 17 年（1663，康熙 2 年），沈光文因作〈臺灣賦〉「諷之，幾不測；乃變服為浮屠，逃入臺北鄙」。⁶⁸同一年友人〈吳正甫忽欲為僧，以柬寄賦答〉：

⁶⁶ 劉慶宇，《清乾隆朝佛教政策研究》，東北師範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頁 66。

⁶⁷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沈光文列傳》，頁 122。

⁶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列傳·沈光文》，臺灣文獻叢刊第 243 種，頁 967。

常說為僧好，君今欲了緣；果然撇得下，只便悟當前。
但使身無累，毋令世有權！釋名余早定，不是愛虛圓（余釋名超光）。⁶⁹

從上得知，沈光文逃禪後法號超光，「入山不出」，現僧相後，先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旋於目加溜灣（今臺南善化）授徒自給。⁷⁰及康熙 22 年施琅克復臺灣後才又公開活動，但仍示以僧相。

然沈光文在未與鄭經交惡之前留有〈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一詩云：

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
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
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頑。
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⁷¹

從詩作呈現出沈光文與佛教的親近，他或許早有逃禪之念，才會稱「釋名余早定」，直到對鄭經得失望，以及國破家亡的感慨下，選擇為僧。他逃禪後留詩一首：

磬聲飄出半林聞，中有茅庵隱白雲；
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窗分。
閒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群。
此日已將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⁷²

⁶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詩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280 種，頁 5。

⁷⁰ 清・張恕修、董沛，《浙江鄞縣志・沈光文傳》，轉引自龔顯宗主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新營：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 44。

⁷¹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865。

沈光文「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⁷³有學人研究認為「羅漢門山中」為今高雄阿蓮大崗山，⁷⁴然所謂「臺之北鄙」，當指臺灣府縣（臺南）之北方，大崗山在府縣南方，地理位置不合。又云「山旁有伽溜灣者，番社也」，⁷⁵前述臺灣第一方志《臺灣府志》僅謂「入山不出，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並未說是入何山，目加溜灣基本確定是在今臺南善化一帶，故羅漢門山可能在善化一帶。

無論如何，沈光文變佛逃禪後，在「番社」傍教授生徒，或是行醫，直到康熙 23 年季麒光來任諸羅縣令，不久共組東吟社活動頻頻，沈光文寫下他們認識的經過：

甲子，先生從梅溪令簡調諸羅。仲冬八日，舟入鹿耳門，風濤大作，不克登岸，遣人假館於天妃宮。時余寄宿僧房……第二日，先生就館後，即往謁上憲。至晚，抵神宮。余投刺，先生即過我，恂恂粥粥，絕無長吏氣，依然名士風流也。⁷⁶

康熙 23 年（1684）11 月 8 日，季麒光抵鹿耳門，翌日，與投宿於天后宮僧房的沈光文初識「一語情深，定交傾蓋，相見恨晚」。⁷⁷季麒光也記錄這段相識的過程：「余自甲子冬月渡海，蹴居僧舍，即晤斯菴先生。見其修髯古貌，骨勁神越，雖野服僧冠，自非風塵物色。」⁷⁸後季麒光「為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⁷⁹兩人感情之深厚可見一斑。

⁷²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藝文志（中）·詩賦·普陀幻住庵·沈光文》，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頁 377。

⁷³ 清·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沈光文》卷 4，臺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頁 297。

⁷⁴ 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 134。

⁷⁵ 清·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沈光文》卷 4，頁 297-298。

⁷⁶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頁 1。

⁷⁷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頁 1。

⁷⁸ 清·季麒光，《蓉洲詩稿選輯·沈斯菴詩序》，頁 91。

⁷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列傳·沈光文》，頁 967-968。

逃禪的沈光文，終其一生並未脫下僧袍，季麒光與其交，可謂佛儒相通，如在〈別沈斯菴〉詩中稱：「兩人證合在蒲團，僧窗夜瞰滄波曉」；⁸⁰在〈春王穀日，諸君子聚飲鎮臺署中，即以聚字限韻賦詩，人不一體，斯菴攜稿索和，雖不及廁席言歡，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因率筆賡續，以當紀言〉詩中曰：「蓮池佛性三峰禪，初明痛哭通天暮」。⁸¹

季麒光常稱沈光文為「老僧」，如在〈除夕口占示友〉詩中稱：「知斯菴老僧有同病也」；⁸²又稱：「座中老僧逸致閒」等等，⁸³當時沈光文已高齡 75 歲。作為逃禪僧的沈光文，如前述現僧相「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一日季麒光因聞沈光文罹病而特訪之：

斯菴老僧一日寢食失平，口藥靜攝。余知而叩之，則為人治病，出門矣。昔五地菩薩游於槃起之國，偶患濕熱，見國人有病，則以醍醐上藥，各往治之。具口慈悲，遂授如來印教。今老僧羈旅之踪，懸壺寄隱，是現藥王身而為說法也。然日為人療濟，而不聞作供養平等法。乃知老僧能活人，而人不能頂禮老僧。搓嗟嗟，舍己之芸，從井之救，余為老僧苦之。惟願如五地之行力，圓滿歡喜，證燈妙果，則庶幾矣。⁸⁴

沈光文「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無假，他在佛學的造詣，季麒光如此形容：「先生修法華三昧，旋證陀羅尼身，入龍宮不啻天台老人，與太夫人康強白首，殆同受如來記以壽者。身得度，而現壽者相以度世，將香雲法雨，放光動地，攝此有緣，眾生同數蓮花。」⁸⁵

⁸⁰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別沈斯菴》，頁 17。

⁸¹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春王穀日》，頁 23。

⁸²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除夕口占示友》，頁 54。

⁸³ 清·沈光文，《蓉洲詩稿選輯·春王穀日》，頁 23。

⁸⁴ 清·季麒光，《蓉洲詩稿選輯·斯菴老僧一日寢食失平》，頁 58。

⁸⁵ 清·季麒光，《蓉洲文稿選輯·沈斯菴雙壽序》，頁 142。

沈光文「修法華三昧」，懸壺濟世，這或許就如同《續修臺灣府志》費應豫（生卒年不詳，活躍於清雍乾時代）之〈彌陀寺〉一詩中所形容的「山僧無俗韻，盡日檢醫方」⁸⁶的情況。楊惠南評論明末遺臣在臺所構成的「名士佛教」：「沈光文的入山，不管是來臺前的隱居浙江普陀幻住菴，或是來臺後的入山為僧，都不是出於自願。」⁸⁷

（三）海會寺志中和尚

清代建於府城的海會寺（今開元寺），是臺灣第一大叢林，為鄭經別館，《臺灣府志》載：「海會寺康熙二十九年建。在府治北六里許。舊為鄭氏別館；蕩平之後，總鎮王化行、臺廈道王效宗因其故趾（址）建為寺宇。佛像最勝，住僧雲集焉。」⁸⁸這是一座官辦寺院，王化行去任後鳳山縣令閔達在〈總鎮府都督王公去思碑〉說：「臺之十營諸將帥思公之德不置、感公之德難忘，謀刻石於海會寺中，以垂久遠。寺為公剏，見寺如見公焉。」⁸⁹

總鎮王化行（生卒年不詳），陝西咸寧縣人，康熙 9 年（1670）武進士，康熙 27 年（1688）任臺灣總鎮，秩滿，調湖廣襄陽總兵。⁹⁰臺廈道王效宗（任期 1683-1691），正白旗人，康熙 26 年任分巡臺灣道。⁹¹他們二位帶頭捐俸建寺，同時禮請志中和和尚主持，王化行在〈始建海會寺記〉說：

⁸⁶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954。

⁸⁷ 楊惠南，〈明鄭時期臺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收在《當代臺灣佛教文獻》，<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md/md03-08.htm>，2018/04/26。

⁸⁸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19。

⁸⁹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68。

⁹⁰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武職》，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頁 115。

⁹¹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126。

蓋聞二儀效靈，人天永載無窮之運；萬物資始，凡聖統成有象之緣。法藉運而後興，道因緣而乃遇。故內典流於中夏，妙諦通乎遐陬。花雨香風，眼前解脫；招提蘭若，方外聲聞；有由來矣。顧茲臺灣版圖新闢，德教覃敷，神人胥慶，典章無關；惟少一梵剎，福祐海天。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林，朝煙暮靄。諸同人瞻仰於斯，僉曰：是三寶地，何不就此立寺招僧迦以修勝果，亦盛世之無疆福田也。時兵巡王公，同聲許可。會有僧志中者，自齟齬之年，皈依沙門，秉靈慧沉靜之聰，函松風水月之味，從江右雲遊，來聞其事，願募緣成之。於是同人各捐俸資，補葺門楹，重整垣宇，裝塑佛像；始於庚午八月七日，成於明年四月八日，名曰「海會寺」。⁹²

「附郭大橋頭有廢舍」即指鄭經別館，王化行等人「立寺招僧迦以修勝果」，志中和尚「從江右雲遊，來聞其事，願募緣成之」，成就了此一因緣。海會寺從康熙 29 年（1690）8 月 7 日肇建，至康熙 30 年 4 月 8 日竣成。

由於海會寺是在鄭經別館的基礎上改建，因此才能以不到一年的時間竣成。落成後志中和尚，以佛寺少一梵鐘而坐關募化，由其弟子福宗任住持，從鐘銘上的「康熙乙亥年孟春」得知，該鐘是在康熙 34 年（1695）鑄造完成，鐘銘上載：「泉州府僧行和，海會寺開山第一代，坐關募緣鑄鐘重一千六百觔」，募鐘圓滿的志中和尚出關時，並留下志中和出關偈：「獨坐釘關結善緣，募鐘立願利人天；一聲擊出無邊界，同種功德億萬年。」當時鳳山縣令閔達（1690-1694 在任）特譽此出關偈「為臺灣諸剎出第一手眼也」。⁹³

綜合上述，有關於志中和尚的資料僅如此，即「齟齬之年，皈依沙

⁹² 清・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頁 470-471。

⁹³ 王進瑞，〈開元寺緣起に就て〉，《臺灣佛教》21:4，1943 年，頁 34。

門」、「江右雲遊」、「泉州府僧行和」，幼年（10 歲之前）出家，及長雲遊江右（江西），後卓錫於泉州府，法號行和。日本殖民時代鄭羅漢（卓雲）曾撰〈開山志中和尚小傳〉說：

志中能禪師，別號行和，中華福建泉州人氏。性靈敏，自幼出家，住承天寺，不數年明教通宗，乃雲遊四方，從江右來臺。康熙二十八年庚午，聞王觀察欲改北園為寺，願募緣成之。及寺落成，舉為住職，尋即隱退閉關三載，至乙亥出關。有偈云：「獨坐釘關結善緣，募鐘立願利人天；一聲擊出無邊界，同種功德億萬年。」蓋鑄鐘之偈也。後衣鉢傳授法嗣福宗、福珀、福儀諸禪師等，莫詳其何年入寂，有像祀開山堂祖師殿。⁹⁴

鄭羅漢說志中為「中華福建泉州人氏」，是以「泉州府僧」為據，然以「住承天寺」，則是過度延伸，畢竟泉州寺院不知凡幾，志中未必是卓錫承天寺。

梵鐘的銘文記有志中和尚的徒子徒孫，除有「當代住持僧福宗建造外」，還有福珀、福儀、祥共、祥慶、祥雲、祥光、祥正、澄透、澄鴻，總共 11 人，所以《臺灣府志》才會說「住僧雲集焉」。從法號別來看，這顯然是師徒四代。

志中和尚為「泉州府僧行和」，故可稱之為志中行和，其師徒四代以「行——福——祥——澄」為譜名排序，與，明末曹洞宗一代宗師湛然圓澄（1561-1626）弘化江南，而其派下的演偈「圓明淨智、德行福祥、澄清覺海、了悟真常」相符。⁹⁵如果從志中和尚「從江右雲遊」的

⁹⁴ 鄭羅漢，《臺灣開元寺略稿·開山志中和尚小傳》，臺南：開元寺，1930 年，無頁碼。

⁹⁵ 洞山下二十八世（雪庭下十四世）順德開元萬安廣□禪師姓賈，另演三十二字俗呼為賈菩薩宗，參見《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 1667, p. 564, a11-12。

地緣關係來看，與湛然圓澄弘化江浙吻合。

按圓澄的派下演偈「圓明淨智、德行福祥、澄清覺海、了悟真常」，「德」字輩下接「行」字輩，前述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行和與其徒弟字號演偈為「行——福——祥——澄」，與圓澄派下演偈一致，故知志中和尚所傳一脈為曹洞宗雲門系。

第二代住持外（剃）號竺庵，內號（譜名）福宗，鄭羅漢的〈竺庵禪師略傳〉道：「竺庵福宗禪師，志公之高足也。天資醇篤能詩書，精武術有眾望，續志公衣鉢後大振宗風，得祥慶、祥雲、祥光、祥共、祥正等一班賢哲同轉法輪，而海會興盛一時。」⁹⁶文武雙全的福宗，其生平如何亦不可知，而其他「福」、「祥」、「澄」字輩法師更不知其所以，直到澄聲和尚的出現。

根據《重修臺灣縣志》載：「釋澄聲，號石峯，海會寺住持也。戒行素著，擅書畫，好詠吟，尤善手談。有司聞其名，多就訪之。時或苦旱，延以祈雨，屢驗。」⁹⁷澄聲雖未名列 1695 年海會寺梵鐘，但與澄透、澄鴻同輩，故活動時間上並不會相距太遠。澄聲「擅書畫，好詠吟」，還被「延以祈雨」，為清治臺初期的佛教樣貌之一。

五、結語

雖說臺灣佛教「祖敘（述）福建，律依鼓山，祀配天妃」，⁹⁸乃是自明鄭清初以來的樣貌之一。但從季麒光所遺留的資料，可以看到明鄭至清治臺之初的佛教情況：

⁹⁶ 鄭羅漢，《臺灣開元寺略稿・開山志中和尚小傳》，無頁碼。

⁹⁷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392。

⁹⁸ 梁湘潤、黃宏介合編，《臺灣佛教史初編》，頁 19。

首先，沈光文這位「逃禪」的名士，終其一生，並未脫下僧服，平常授課之餘還兼行醫。明鄭諸多逃禪之士如李茂春（？-1675）⁹⁹、祝髮為僧的林英（生卒年不詳）¹⁰⁰等人，都以獨善其身而終，並未對臺灣佛教有重大影響。所謂的「名士佛教」只能是騷人墨客的自娛。

其次，作為官寺的臺南大天后宮，從寧靖王捨宅為寺後，歷有僧人住持其中，其中福清黃檗山第 14 代住持為良準明標（1652-1734），與今大天后宮〈奕葉相承〉所載為同一人，他是否來過臺灣姑且不論，但作為臺灣僧綱司卓錫之地的大天后宮，「黃檗（檗）之徒，實授衣鉢」之語當不假。但是否如同隱元禪師赴日後，掀起日本佛教近世高潮，則有待討論。

⁹⁹ 據《臺灣府志》載：「李茂春，字正青，漳州府龍溪人，登明隆武丙戌科鄉榜，遯跡至臺，偽藩延以教其子經。其為人好吟詠，喜著述，日自放于山水間，跣足岸幘，旁若無人。知經非令器，素不加禮。構一禪宇，扁曰「夢蝶處」；與住僧禮誦經文為娛，自號李菩薩。尋卒于臺，因葬焉。」清·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19。又據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載「夢蝶園：在永康里。漳人李茂春遯跡於此，構茅亭居焉（陳永華記：昔莊周為漆園吏，夢而化為蝴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謂莊生善寐，余獨謂不然。夫心閒則意適，達生可以觀化，故處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禁；醒何必不夢，夢何必不蝶哉！吾友正青善寐，而喜莊氏書。晚年能自解脫，擇於州治之東，伐茅闢圃，臨流而坐，日與二、三小童，植蔬種竹，滋藥弄卉，卜處其中，而求名於余。夫正青，曠者也，其胸懷瀟灑無物者也。無物則無不物，故雖郊邑烟火之所。比鄰遊客樵夫之所聞咽，而翛然自遠；竹籬茅舍，若在世外，閒花野草，時供枕席；則君真栩栩然蝶矣。不夢夢也，夢尤夢也。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脫，且羨君之先得，因名其室曰夢蝶處，而為文記之）。今為法華寺。」，見清·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頁 335。

¹⁰⁰ 據《臺灣通志》載：「林英，字雲又，福清人，崇禎歲貢，積學負文名，任昆明令，有神明之稱。永明王時，為兵部司務。壬寅，削髮為僧；從雲南遁至廈島，旋入臺灣（「東平紀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頁 497。

第三，從明鄭至清治臺初，缺乏穩定道糧的僧人與寺院，依託官方賜與僧田為一常態，如鳳山縣興隆寺、大天后宮等皆是。這符合清代律令，若未得官方允許，不得私建廟宇之型態。

第四，明鄭及清初入臺僧，為「臨濟宗支僧」或「臨濟橫支」，為臨濟宗支派，表示非「臨濟正宗」，而建於 1690 年的臺南海會寺，首任住持志中和尚師徒，為來自江西之曹洞宗，祖承晚明湛然圓澄一系。只是傳承四、五代後即為鼓山臨濟法系所取代。¹⁰¹

¹⁰¹ 參見闕正宗，〈開元寺傳承發展史〉，《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開元寺，2010 年，頁 17-167。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與古籍

《宗教律諸宗演派》，CBETA, X88, no. 1667。

《小琉球漫誌》，清·朱仕玠，臺灣文獻叢刊第 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黃檗山寺志》，杜潔祥主編，臺北：明文書局，1980。

《重修臺灣縣誌》，清·王必昌，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重修鳳山縣志》，清·王瑛曾，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4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清先正事略選》，清·李元度，臺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清耆獻類徵選編》，清·李桓撰，臺灣文獻叢刊第 2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黃檗開山普照國師年譜》，性派，1684 年之後刻版。

《福建通志臺灣府》，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臺陽見聞錄》，清·唐贊袞，臺灣文獻叢刊第 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臺灣外記》，清·江日昇，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臺灣府志》，清·高拱乾，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臺灣府志》，清·蔣毓英，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臺灣通史》，連橫，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臺灣通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臺北：臺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1962。

《臺灣割據志》，川口長孺，臺灣文獻叢刊第 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臺灣詩鈔》，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8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臺灣縣志》，清・陳文達，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臺灣輿地彙鈔》，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鳳山縣採訪冊》，清・倪贊元，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諸羅縣志》，清・周鍾瑄，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續修臺灣府志》，清・余文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續修臺灣縣志》，清・謝金鑾，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現代專書、論文

王進瑞，1943，〈開元寺緣起に就て〉，《臺灣佛教》21:4，頁 34。

匡宇，1979，〈臺灣佛教史〉，《中國佛教史論集》冊 8，臺北：大乘文化，頁 11-18。

江燦騰，2009，《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出版社。

何聯奎、衛惠林，1989，《臺灣風土志》，臺北：中華書局。

吳疆，2017，〈黃檗僧東渡斷絕考：十八世紀江戶幕府的唐僧招請〉，《漢語佛學評論》5，頁 196-235。

李祖基點校，2006，《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本選輯包含清・季麒光著，《蓉洲詩稿選輯》、《蓉洲文稿選輯》，及《東寧政事集》。

李添春，1956，〈臺灣佛教史要〉，《中國佛教史論集》冊 3，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頁 938-953。

李添春，1979，〈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中國佛教史論集》冊8，臺北：大乘文化，頁57-73。

相良吉哉，1933，《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

梁湘潤、黃宏介合編，1993，《臺灣佛教史初編》，臺北：行卯出版社。

野川博之，2003，〈台南黃檗寺考——古黃檗末寺の盛衰〉，《黃檗文華》122，頁53-75。

陳正茂、林寶琮、林世宗，2008，《新編臺灣史》，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

曾吉連，2001，《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

黃文博、涂順從，1995，《關仔嶺大仙寺》，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臺南大天后宮管委會，2005，《明朝寧靖王府邸祀典臺南大天后宮》，臺南：臺南大天后宮管委會。

劉慶宇，2008，《清乾隆朝佛教政策研究》，東北師範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

鄭羅漢，1930，《臺灣開元寺略稿》，臺南：開元寺。

闕正宗，2010，〈開元寺傳承發展史〉，《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開元寺，頁17-167。

龔顯宗主編，1998，《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新營：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其他

〈南陳宗親網·泉州開元寺〉，<http://www.nanchens.com/xqxx/xqxx27/xqxx27012.htm>，2017/04/05。

《當代臺灣佛教文獻》，<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md.html#03>，2018/04/26。

楊惠南，2002，〈明清時期臺灣佛教的神佛不分與三教同源〉，《臺灣文獻》53: 3，<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md/md06-06.htm>，2018/04/26。

楊惠南，2002，〈明鄭時期臺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臺灣文獻》53: 3，<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md/md03-08.htm>，2018/04/26。

蔡維斌，〈北港朝天宮傳說迎媽祖來台的和尚找到了〉，《聯合報》，2013年11月22日，A26。

